

人类存在的矛盾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闫国疆

(新疆财经学院 马列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12)

摘 要 实践活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使人与世界间构成了独特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通过实践,对“终极存在”予以确认、对“终极解释”予以占有、对“终极价值”予以规定来奠基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实践无限的指向性的必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世界历史。立足现在、反思历史、远瞻未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超越个体生命的短暂和有限,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使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活的一种思考结果。

关键词 矛盾性;人类存在;和谐;自由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6)01-0018-05

如何解决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是人类的一个哲学难题。构建和谐社会,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从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和实践的角度考察人类历史,以历史的资源为资治之鉴,可以知利弊得失、兴衰存亡之道,通过对现实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的考察与思考获得协调、平衡、公正、公平的和谐实施,使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得到统一,使短暂的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时提出,要把中国建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更加和谐”的社会。胡锦涛又在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并且在2005年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生活的一种思考结果,同时也是对全人类应该如何生活才能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一种思考结果。

一、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

伴随着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带来日渐丰裕的物质生活,人们逐渐开始品尝被破坏的世界给予人类报复的苦果:全球性的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等。于是,对于各种各样有悖于人类长久生活和环境持续良性循环发展的活动,有

所省悟的人们开始反思,并有许多人将其归罪于“利益最大化”。认为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人都在极力追寻的“利益最大化”这一可恶的观念引导着人们惟利是图,是“利益最大化”这一观念驱使着人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目标得以实现,不再顾及他人与社会的利益,至于其他什么动物与自然的利益,则更是无暇顾及,不予考虑。这才使得现代社会的人异化成了惟自我和物质为第一的“经济动物”。于是许多省悟的人开始指责“利益最大化”,指责工业文明。认为世界报复的苦果是工业文明和“利益最大化”的观念结出的,是“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日渐深入持久化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导致了今日人类岌岌可危的现实。但是,单一的指责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且这种指责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从人的存在来看,实践活动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从“自然”、“自在”的活动出发看待世界,人类统一于物质世界,根本属性是自然性,物质世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据,人类更多的只能体现出作为“物质”的一面,体现出更多的自然性,而不会体现出社会性来。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真正地证明了自己是类存

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当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开始意识到人和人的世界就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产物的时候,人也就开始意识到社会性才是自己的根本属性。而‘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的存在着^[1]。正是由于有了类意识,人类才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类存在;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自为的’或‘自觉的’存在,人类本身就是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据,人可能就可以摆脱自然性而不会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不会追求‘物质至上’了,就会从一个‘经济动物’转化为‘社会动物’,成为真正的人。

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人类的创造性、未完成性和无限的开放性,就是人类存在的实践性。人类存在的矛盾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存在的实践性,或者说人类存在的实践性,是人类存在的全部矛盾性的根源。

作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活动体现出明显的二极性,即:实践主体的自然与超自然性,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实践活动的两个尺度——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以及实践活动的客观主体化与主体客观化。实际生活中,人的任何实践活动无论任何时间都是在人给自己构成的关于世界的客观图画以及把这种图画变成现实的决心这一理想性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人给自己构成’的关于‘世界的客观图画’,以及把这种图画变成现实的决心^[2],却总是要与‘世界自己的’客观图画——即尚未被人的决心所改变的世界——有着差距,存在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深刻矛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人的理想,人总是在不断的努力以克服这种差距和矛盾。人类实践活动的每次现实和个别实现是有限的,而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却是一个无限的历史展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实践得以完成和无限地展开,实践活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使人与世界间构成了独特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世界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自在世界的‘现实性’变成了‘非现实性’,自为的人的‘理想性’变成了真正的‘现实性’,并进而使世界变成了‘自在自为’的现实——按照人的理想所创造的客观存在,并且这种转变也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的扩大和深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开始脱离个体生命的‘短暂’和‘有限’,逐步地走向完全的自由。基于这种实践的人类思维则总是表现为对无限的追

求;寻求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寻求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寻求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人们总是‘试图通过对‘终极存在’的确认、对‘终极解释’的占有、对‘终极价值’的规定来奠基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即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2],这是实践无限的指向性的必然。

二、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存在矛盾性表现的差异

人类历史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3]的活动过程。在实践中,人们对意义的创造与对意义的自觉是互为前提的。生活在今天的许多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物质存在,更是社会存在,认识到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和自在的,更应该是自为的和自觉的、社会的人。因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4]摆脱了饥贫困扰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仅仅关心“现在能否生存”的问题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能否更好的、更长时间的生存”的问题了,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存在才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一问题了。在实践中,人们不仅有了对意义的自觉,而且有了对意义的创造。

从世界历史来看,经过工业革命后两百多年的发展,人类在享受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比以往历史的人类要少受世界约束的多的自由之后,也看到了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自由的”人为了保证个人欲望和利益的满足而出现的尔虞我诈、丧心病狂,看到了大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看到了人类对世界肆无忌惮的掠夺和对人类生活的世界的破坏,看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日渐恶化的关系和被破坏的世界所给予人类的报复,更看到了按照自己的理想被改造的世界和已经被大大人化的世界依旧倔犟地按照自己的规律所绘出的客观图画之间的不和。于是,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究竟怎样才能保证我们不再为自己的实践活动付出惨痛的代价、不再受到被破坏的世界的报复?今天和明天的人怎样才能活得更好、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

受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给自己构成的‘世界客观图画’和世界自己的‘客观图画’却是有所不同的,人类对想要超越短暂和有限所寻求的无限的认识也就可能有所差异,展示出来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也就可能形象迥异。

阴阳学说中;“阴”与“阳”被看作是世界的终极矛盾,认为“阴”与“阳”只有达到和谐才能使世界万

事物万物蓬勃发展,并且认为这种对立的和谐,不是机械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易传·文言》提出了精湛的天人合一思想,它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与天地合其德”,是指人与自然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所谓“先天”,即为天之先导,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之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从“天而动”^[5]。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6]。意思是说道产生原初混沌的元气,元气生出天和地,天地生出阴气、阳气以及和气,和气生出千差万别的物质。显然,这里的“和气”就是讲的和谐。“阴阳混合适中”,就是讲阴阳二气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进而产生一种和谐状态。

西周末年的史伯已经认识到,由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效果。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7]。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联结在一起。不同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这种‘和’与‘同’的区分说明对矛盾的同一性已有一定的认识,解说生动而又深刻”^[5]。“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果仅有同种事物存在,那么发展就无法进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承认差别,差别可能产生矛盾冲突,矛盾冲突而加以协调化解,最终达到和合。

儒家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8]。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9]。把“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表现了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荀子·天论》中讲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更是看到世界不人为而存亡的客观现实。因此,要解决人之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只有“应之以治”,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动态的实现“和”。《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把孔子所主张的持中原则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高度,强调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来实现“和”之理想,达到和谐这一最好的秩序状态,实现最高的理想追求,实现人与人

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平衡。这种和谐观,在汉代以后,历代思想家基本都是认同、继承并且努力予以实践的”^[5]。这种强调在动态中实现的和谐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以“和为贵”、“求同存异”为解决矛盾的主导观念和方法的作用之下,在人类其他古代文明一个个被外来文明瓦解与毁灭之时,华夏文明虽然几度被外来文明所冲击,但是却能不仅没有被毁灭,反而能融外来文明于一体,同化其他入侵文化而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事实说明,在处理矛盾中一概排斥是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行不同通的;在矛盾中求得和顺或和谐,作为处理斗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有道理的,也是可取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过“和谐社会”这一历史现象。在中国,无论是商周以前禅让制的王道之治,还是《礼运》篇“大同”的理想世界,以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共和理想,都没有放弃和谐社会的追求。且不说先秦诸子百家所仰慕的“三代”是“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就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漫长发展进程中,历朝历代出现的“盛世”,也都可以说是和谐社会,或者说是“传统的和谐社会”。“传统的和谐社会”也有多种形式。在中国有典可考的历史中,有秦始皇所要建的专制集权式的和谐社会;有文化上“明教化”“独尊儒术”,建立大一统的精神文化的汉武盛世;也有“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和满清入关之后的“康乾盛世”。这些盛世虽然历时不同、各有千秋,但无论哪一种盛世都是一个多方面和谐发展的社会。

纵观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经历了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和谐的,由于当时以手工劳动为主,人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还比较低,人整个说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者说附属于自然,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大量的自然规律人们不能或者说不完全揭示,人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自然界的奴隶”,因此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实际上是一种蒙昧的和谐。面对当前全球性的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种种现象,人们不断反思,认识到人类只有能动地去关注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携手,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过去与现在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对话,时间与空间的协调,才能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国人结合实际,遵循着

世界的客观规律进行着高速有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实践就是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和规律性”的统一,是人类改变世界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践即使自在的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又使人自身实现了自我发展,使 13 亿中国人走上了小康之路。

今天,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利益格局调整加快,矛盾冲突甚至激烈冲突增多,对传统的矛盾冲突消解模式也提出了挑战。“如何避免重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出现过的一面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面是社会矛盾加剧积累,进而引发社会混乱的现象。”转型的社会呼唤着“在坚持协调、全面、可持续这一正确的发展观的同时,必须进行矛盾化解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实现理想性和现实性矛盾处理模式的现代转型,消解矛盾,实现社会良性和谐可持续发展^[10]”。这是 20 多年来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类型变迁的必然结果,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凭借人民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中国创造了新的历史,综合国力得到了提升,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时期。虽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很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分裂势力等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不少^[11]”。但是,已经摆脱了饥贫困扰的中国社会“总体是和谐稳定的,现在是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的和谐程度与和谐水平。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把握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清醒地把握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11]”。

三、解决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矛盾的思路

“从人类历史的实际过程看,人类的各种群体,大到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小到社群、团体、家族、家庭,以及属于各种群体的个人,在经历着矛盾对抗甚至冲突的同时,进行着联系、交往和合作。总的来说,在人类各个群体之中和群体之间,人与人的矛盾、对抗和冲突正在减弱,联系、交往和合作正在加强^[12]”。对于这种历史趋势,我们除了解释为是人的类本质或类本性使然之外,还找不到更令人信服的其他解释。

康德认为,人类有“天生的理性要求”;它要求

人类不是表现为恶,而是一个从恶不断地进步到善,在阻力之下奋力向上的理性生物的类。于是人类的普遍意志是善的,但其实现却困难重重,因为目的的达到不是由单个人的自由协调,而只有通过存在于世界主义地结合起来的类的系统之中,并走向这个系统的地球公民的进步组织,才能够有希望。^[13]希望建立起把所有群体和个人结合起来的“地球公民的进步组织”,形成一个真正和平、和谐的人类系统。现在看来,这一愿望并不完全是空想,其中有的已经在部分领域在初步的意义上变为现实。

“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1]只有与类生活内在联系的个人生活才是真正的个人生活,反过来说,也只有与个人生活内在联系的类生活才是真正的类生活。个人生活与群体生活和类生活的脱节和不和谐,是人类生活中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是应当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恩格斯认为,这种条件是人类社会自身有能力创造的。他说:“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14]合理地、合乎人的本性地组织起来的人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幸福,使短暂的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意义,并不是如某些人所理解的那种“物质主义”和“利益至上”,而是“认为人类真正幸福的生活只能建立在由生产力充分发展所造就的坚实基础之上。在物质生产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建立起普遍富足的人类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群体和人类主体性的第一步^[12],是实现个人、群体和人类完全自由的第一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加上人本身全面而又自由的发展,才是人类主体性、人类自由的全部内涵。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说:“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自己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些个体可以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实现自己的利益。……后现代观念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这种意识深刻认识到,个人的利益和他(或她)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整体利益是分不开的。……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15]不仅为个人,同时也为群体和人类工作,具备这种意识的人正是康德曾经设想过的‘世界公民’。”

当前,两个重大使命摆在人类面前:一是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保护好自然环境,避免生态危机,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处理好人类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减少以至消除由于同类相争而造成的内耗和灾难,使我们这个星球的“村民”们能够和睦相处。完成这两个使命,是对人类的最大考验,“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个人、群体和人类作为主体的一致性。人类在完成这两项使命的同时,就会使人类的主体性与群体和个人的主体性更加完善起来^[12],也就使人类本身更加完善起来,从而使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矛盾得以解决。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保护好自然环境,避免生态危机,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处理好人类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减少以至消除由于同类相争而造成的内耗和灾难,使我们这个星球的“村民”们能够和睦相处的最好方式和方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治国理想,又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结果。

“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中国人民通过劳动创造自己和世界历史。这是一种既讲物资利益原则,又注重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紧密结合的实践,也是使人类的主体性与群体和个人的主体性更加完善起来,使人类本身更加完善起来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有限,使人从自然的、自在的存在变为自为的、自觉的存在,使人脱离在劳动中产生的异化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人,使短暂的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的实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

在于改变世界。^[16]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在深刻分析和认真思考了中国实际之后,不仅对奠基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予以的新的确认、占有和规定,并且在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观及其最基本的运作法则——对和谐与均衡的追求,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与均衡的追求——这一理念的传承与实践开始改变世界、创造历史,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和实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97,123.
- [2] 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93,199-201.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3.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1,310.
- [5]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78,390,392-393.
- [6] 老子·四十二章[M].
- [7] 国语·郑语[M].
- [8] 论语·学而[M].
- [9] 论语·子路[M].
- [10] 孙辉.转型社会与社会治理工作的转型——转型期第三部门在社会矛盾消解中的作用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4(12):5-11.
- [11] 曾庆红.关于国内形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N].学习时报,2005-03-07(1).
- [12]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53,155,156.
- [13] 康德.实践人类学[M].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246.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12.
- [15]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24-225.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